



信息与公告	热点与专题	动态与关注	重点与推荐	重建与复兴	历史与圣贤	经典与教理	生命与体证	道场与礼制	国家与教化
风俗与日用	公益与慈善	判教与卫道	中国与世界	艺文与考据	学术与争鸣	儒门报刊	书目推荐	域外宗教	学者文集

当前位置： [首页](#) > [学术与争鸣](#) > [文章内容](#)

【推荐】近十年来中国大陆两汉儒学研究的基本走向和最新进展

王启发 2010-8-24

近十年来中国大陆的两汉儒学研究大体呈现出三个基本走向，一是以经学为核心，涉及汉代的思想学术、社会政治、法律生活等方面的研究，论著和论文相对比较多。二是以儒学为核心，所涉及的范围比前一个方面略广，还包括汉代的宗教、经济、教育等方面的研究，专著和论文也有不少。三是对汉代历史多角度的研究中涉及儒学问题的方面，如官制、礼制、社会组织、地方豪族、门阀世族、丧葬、礼俗、画像石等，有一些著述和论文有所论及，但是总体上显得不足。目前两汉儒学研究存在的问题主要反映在如何就以上三个方面做综合性的研究，这将促进学术界的历史学与思想哲学相结合，进行更为广泛深入的两汉儒学研究。

### 一、两汉经学及经学思想研究

众所周知，汉代学术的核心在于儒家经学，汉代的政治史称经学政治，汉代的法制也是以经为法，因此，以经学为核心，对汉代的思想学术、社会政治、法律生活等方面进行考察研究，是近年来两汉儒学儒教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出版的论著和发表的论文相对比较多。

第一，从思想学术角度全面考察和研究两汉经学，代表性的论著当首推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二卷第24章至39章的汉代经学部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9月），该书是目前中国大陆第一部系统研究经学思想史的论著，基本上涵盖了两汉经学的主要人物、主要经典和主要的经学问题。既有总括性的论述，又有个案性的研究，特别着重从思想史的角度把握经学在汉代的发展演变及其与汉代学术、政治之间的关系。该书研究的主要特点是对汉代的诗学、易学、尚书学、礼学、春秋学、孝经学、纬书学等作了全面的研究，既注重经学传承关系的史料考证，又注重经学思想本身价值的解释与发掘，就一个经学人物或一部经学典籍而做充分的、展开式的、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涉及到的思想学说广泛而且深入，涵盖了汉代的政治、道德、宗教等多个方面。王葆玟《今古文经学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是一部以两汉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学派形成、演变及相互间的论争为纲，兼论汉代春秋学、礼学、易学的学术演变的著作。该书史料考据和理论探讨相结合，对一些经学问题包括经典的传承谱系、经学人物的学派分野、汉代宗庙（明堂、辟雍、太庙）礼仪制度等进行了细致缜密的考证，并特别对五德终始、阴阳五行、宇宙系统论的经学思想从“宗教到哲学”的演变历程有深刻思考。

第二，从政治的角度讨论两汉经学的影响和作用的著作有，汤志钧等《西汉经学与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5月）着重于考察论述有关西汉儒家独尊和董仲舒的法《春秋》、崇《公羊》对西汉政治的影响，儒经博士从“备顾问”到“参国政”的政治地位变化，从“盐铁论”到“石渠阁论”儒生的直接参与议政和经学成为统治思想的依据，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的经学与政治的关系，以及五经博士与今文经学、西汉经学的传授、“庙议”所体现的西汉礼制建设、伴随着西汉终结的今古文经学更替与王莽改制等问题。陈苏镇著《汉代政治与〈春秋〉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3月）一书重点在于探讨汉代政治的演变以及《春秋》学在其中所产生的作用和发挥的影响。孙筱《两汉经学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0月）对两汉经学兴盛的历史背景与制度基础、两汉经学的文化渊源、两汉经学的传承与经说、通经致用下的汉代社会等问题进行了考察研究。张涛《经学与汉代社会》（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则是全面介绍汉代经学与社会的简明读物。这方面论文有，张涛《经学和汉代的选官制度》（《史学月刊》，1998年第3期），仝晰纲《公羊学与汉代政治文化》（《辽宁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谭德兴《齐诗“四始五际”与汉代政治》（《贵州文史丛刊》，2000年第5期）等。

第三,从哲学、文学、学术史等方面来考察汉代经学的影响的著作有,严正《五经哲学及其文化学的阐释》(齐鲁书社,2001年8月),该书对汉代经学有专门的论述,具体包括三家诗说和毛诗说、西汉《尚书》学的意义和作用、西汉的礼制建设、西汉的易学发展、董仲舒春秋公羊学思想的意义等。刘松来《两汉经学与中国文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年6月),从文学视野中的经书文本,文化视野中的两汉经学与经学视野中的两汉文学这三个方面,考察了两汉经学与文学的关系问题,重点在于考察经学语境中生成的汉代文学理论,两汉经学对后世文学的深远影响等问题。王继训《汉代诸子与经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主要探讨汉代诸子百家之学与经学的关系,经学与诸子学的相互交汇、融通的历史进程,透视两汉经学融合诸子学而构成汉代儒学的发展过程与思想理论上的贡献,并特别论述了经学与诸子百家学的界限、与阴阳五行及谶纬的关系等问题。蒋庆《公羊学引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6月)是针对春秋公羊学方面的专门性论著,其中对司马迁、董仲舒、何休等人物与公羊学的传承关系有所论述,尤其是所论司马迁传公羊学、司马迁史学承继了公羊学的精神,多有启发性的见解。谭德兴著《汉代〈诗〉学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从社会政治、经济和学术文化等背景上分析了汉代《诗》学发展演进的特点和规律,探讨了其在经学与文字互动中的表现及意义,研究和论述了其发展方向和影响,最终揭示了汉代《诗》学与中国古代儒家思想、文学及文论的内在关系。庞天佑《秦汉历史哲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3月),该书在上编第6章“经学与汉代史学”着重从经学对汉代史学家知识结构与汉代史学思想的影响,汉代史学的经世致用,汉代史家的治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了细致的考察研究;在下编集中对董仲舒、司马迁、王充、班固等人的历史哲学思想进行分别了论述。刘玉建《两汉象数易学研究》(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9月)对两汉时期象数易学的代表人物蔡景君、孔安国、孟喜、焦延寿、京房、马融、郑玄、荀爽、刘表、宋忠、虞翻等人的生平、著述、学术传承及其后世影响进行了详细、系统地论述。还有吴雁南、秦学欣、李禹阶主编《中国经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是新近出版的经学全史,包含有汉代经学部分的记述。

第四,对汉代谶纬之学的研究,也有一些专门性论著发表和出版。钟肇鹏《谶纬论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1月)是系统研究谶纬的研究专著,该书第5章专论“谶纬与汉代今文经学”,其中对《春秋公羊传》、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与谶纬,孟喜、京房易学与易纬,今文尚书、齐诗与谶纬,《白虎通义》与谶纬等问题有细致的考察,对谶纬与后汉政治、谶纬与农民起义,以及谶纬的哲学思想、谶纬的神学体系、谶纬与历史等问题有所研究。冷德熙《超越神话——纬书政治神话研究》(东方出版社,1996年5月)着重对纬书神话学进行了充分的考察和研究,作者详细讨论了圣王、圣人、孔子神话的意义、功能及得失。这方面的论文有,刘泽华《汉代〈纬书〉中神、自然、人一体化的政治观念》(《文史哲》,1993年第1期),董平《论汉代谶纬之学的兴起》(《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2期),张广保《纬书与汉代政治》(《原道》第五辑,1998年),孙曙光《谶纬与汉代政治的神秘性》(《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2期)等等。

第五,从法制史角度研究春秋决狱的文章有,周少元、汪汉卿《〈春秋决狱〉佚文评析》(《安徽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华友根《西汉的春秋决狱及其历史地位》(《政治与法律》,1994年第5期),颜雅彬《略论汉代春秋决狱之利弊》(《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朱宏才《春秋决狱及其对传统文化的危害》(《攀登》,2001年第2期)等等。

## 二、儒学史及儒家人物思想研究

以儒学为核心,从宗教、政治、思想、学术等多个研究领域考察其与汉代社会的广泛关系,成为两汉儒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第一,儒学史和儒教史。两汉儒学史的著作,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不断出现。赵吉惠、郭厚安、赵馥洁、潘策主编的《中国儒学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6月)是中国大陆第一部全面论述儒学发展和演变历史的著作,该书第二编“两汉时期儒学的经学化”集中考察论述了汉初儒学、汉武帝独尊儒术、董仲舒与春秋公羊学、两汉经学的传承授受及其法典化、两汉经学的今古文之争、谶纬的流行与反谶纬、《白虎通》与谶纬神学、古文经学对谶纬神学的批判、东汉末年轻学的衰微等问题,简明地勾画出了两汉儒学发展的基本面貌。李申《中国儒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该书上册第2章、第3章为“两汉儒教”部分,如张荣明所评论的,与以往的研究重点放在“对儒学观念体系本身的描述和分析上而较少涉及祭祀、天文、历法和音乐等方面的内容”不同,《中国儒教史》是“把思想学说、祭祀制度、历法制度等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做系统性的勾勒和描述”,“以儒教信仰的上帝观念和天信仰为核心,把封禅、郊祀、祭祖等祭祀制度作为信仰的具体展现,并把儒教信仰对天文、历法、音乐诸方面的影响综括起来叙述”。刘蔚华主编的《中国儒家学术思想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12月)第9章到第16章为两汉儒学部分,该书包括了一般儒学史的基本问题和内容,而更多地着眼于学术史的角度展开叙述。此外还有,姜林祥、李景明著《中国儒学史》(秦汉卷)(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6月版)等。

第二,除了专门的儒学史著作之外,就是在新近出版的一些思想通史类的著作中,两汉儒学部分也成为不可缺少的内容。比如刘泽华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11月),该书第2章至第8章是关于两汉政治思想的内容。具体包括:汉初思想家对汉帝国的政治设计,汉帝国的政治“大一统”与独尊儒术,儒家政治观念的经典化与社会意识化,西汉后期的政治调整思潮与王莽复古改制思想,东汉前期谶纬化的经学政治观与怀疑论,东汉后期的名教与政治反思思潮等内容。杨鹤泉主编《中国法律思想通史》(一)(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第三卷西汉、东汉部分从法律思想的视角考察和阐述汉儒的思想,具体内容包括:汉初法律思想的演变,陆贾、贾谊的法律思想,西汉中期法律思想领域的斗争,汉武帝的法律思想,盐铁会议和桑弘羊的法律思想,司马迁的法律思想,封建正统

思想的形成和董仲舒的法律思想,西汉后期法律思想的演变与谶纬神学的兴起,扬雄的法律思想,东汉初中期法律思想的演变,桓谭、班固、王充的法律思想,《白虎通》的法律思想、汉末社会批判思潮中的法律思想,崔寔、王符、荀悦的法律思想,郑玄的“以经注律”等等。王高鑫《中国史学思想通史·秦汉卷》(黄山书社,2002年12月)有相当比重的篇幅从史学思想的角度对汉代儒家人物的历史思想进行了考察。俞启定、施克灿《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一卷(先秦、秦汉)(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该书第二编第二节至第五节讨论了儒学与汉代教育制度的关系,涉及的内容有:汉代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及其对汉代教育的影响,博士官学以及师法、家法,今古文经学之争到师法、家法的削弱,通经教学和研究的发展,从石渠阁、白虎观议经到郑玄集大成的经注的出现等。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该书第三编第三节“国家意识形态的确立:从《春秋繁露》到《白虎通》”和第四节“经与纬:一般知识与精英思想的互动及其结果”是专门书写两汉思想中儒学的成分及其影响的部分。该书认为,《春秋繁露》中的根本依据在于宇宙秩序和历史经验,并且就《白虎通》对宇宙秩序和人间秩序的简约化、数字化表述有所讨论。主张重新理解和评价纬学,认为纬学的算术、天文、地理等知识背景,提升了知识的文化品格,同时也加重了儒士中的神秘化与政治化的风气。指出以定“汉仪”、撰《王制》、设明堂为标志的儒者的实用倾向与策略成为当时重要的思想表现。正是在两汉时期,儒家思想中的宇宙观念与实用规范得以建立,经典的揭示系统也得以确立。

第三,在一些关于学术史研究的论著中,也包含两汉时期的相关篇章。比如,卢钟锋《中国传统学术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该书第3章《西汉中的儒学独尊与正史儒学史卷的设立》不仅论述了儒学的独尊与经学的盛行,还以司马迁的《史记·儒林列传》和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作为正史儒学史卷而加以考察论述。张国刚、乔治忠等《中国学术史》(东方出版中心,2002年7月)第2章“以经学为核心的汉代学术”,考察记述了儒家经典化之历程、五经的阐释与传授、经学的今古文之争、阴阳五行与儒学的政治化谶纬化、封建正宗史学宗旨的确立、汉末社会批判思潮及其学术价值等方面的问题。周裕楷《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第2章“两汉诸儒宗经正纬”,从古典阐释学的视角,对两汉儒学经典的诠释形式和特点作了论述和概括。著者认为,在表现形式上,阴阳谶纬属于神学的诠释,诗学教化讽谏属于政治的诠释,训诂笺注属于语言的诠释。又指出,以谶纬为依据来改造经学旧说,以纬书依附于经书而别立新说,经学的高度繁荣导致训诂学的空前兴盛,而经学训诂所强调的文字的载道功能等等都是汉代儒学诠释学的特点。此研究颇见新的角度。关长龙《中国学术史述论》(巴蜀书社,2004年6月)第2章“两汉经学”部分,针对经学的兴起与儒学的重建进行了论述,内容包括:六艺内涵的转变、从《六艺略》说起、大一统王朝的学术张力、董仲舒的经学体用论、经学的异化等。特别指出汉代经学异化的三种表现,即微言大义的谶纬化、章句训诂成为学术主潮、名教问题的出现。从地域文化的角度研究两汉儒学的著作有,孟祥才、胡新盛《齐鲁思想文化史:从地域文化到主流文化》(先秦秦汉卷)(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以两汉经学中的齐鲁儒生为主要线索,对成长和发源于齐鲁之地的两汉儒者的思想学说及历史贡献作了比较详细的考察和论述,包括叔孙通、公孙弘、董仲舒、贡禹、匡衡、曹褒、郎顛、襄楷、郑玄、徐干、仲长统等人得的思想学术。

第四,专门性地论述和考察儒学与两汉社会、政治的关系方面的论著有,刘厚琴《儒学与汉代社会》(齐鲁书社,2002年1月),该书从九个方面论述了儒学与汉代政治、经济、法律、礼仪制度、民族关系、教育、自然保护及抗灾救荒、社会生活、文化的关系等。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5月),该书在第8、9、10章中的一些论题涉及到汉代儒者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内容包括:“独尊儒术”下的汉政变迁、汉儒的政治批判、汉儒的“奉天法古”、东汉的“经术”与“吏化”、儒法合流、儒生与文吏的融合即士大夫政治的定型。陈明《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士族:特殊型态的知识分子研究》(学林出版社,1997年)一书,第5、6章专门就儒学与汉代吏治、儒学与汉代王权展开论述。著者认为,汉代帝王正是看中了儒学的教化功能希望以之弥补吏治的阙失,而汉代“士大夫儒者与宦官、外戚间的冲突,实质上是儒学公天下的价值理念与专职王权思天下之心的斗争”。在论文方面有,刘红叶《汉代儒学伦理政治一体化的形成》(《西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论述了儒学在汉代从日常伦理向政治伦理演变的历史过程。马育良《俗吏吏风:西汉儒家批判的一种治政现象》(《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白华《汉代儒学官学化的动力及其影响》(《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论述了君主\*\*\*\*和儒家学派利益决定了汉代儒学走上官学化的道路,而官学化的儒学对后世的政治、道德、思想学术和社会生活有着多方面的历史影响。惠吉星《论汉代儒学的社会化走向》(《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3期)一文,以“社会化”一词来概括汉代儒学的变迁,并对其过程进行了论证,亦即在当时国家政权倡导和推动下,儒家知识分子和儒生化的官吏通过教育、教化的手段,将儒学的文化知识、思想观念、伦理道德和礼仪规范灌输给社会的各个阶层,使之成为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信仰和生活模式,其对后世的\*\*思想文化、民族文化心理、国家社会生活影响之为深远,所谓“儒教中国”就是汉代儒学社会化的结果。赵沛《汉代儒学入仕到门阀垄断》(《甘肃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提出,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入仕成为汉代选官制度变革的具体体现,也成为儒学世家为官的“士族”登上政治舞台的历史开端,并认为以儒学入仕就是以经学入仕,这也就导致了东汉时期一些士大夫家族纷起,专攻一经或兼通数经,由经学入仕到累世公卿的现象出现,而且两汉的察举选官中的举孝廉、茂材、贤良文学,也都与经学有关。从儒学入仕到门阀垄断演变,主要源自于儒学入仕中的门第观念以及经师、门生与故吏集团的形成对选举产生的影响,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谢谦《汉代儒学复兴运动与郊庙礼乐的正统化》(《四川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认为,汉武帝罢黜百家,建立起大一统王朝的国家宗教,但其郊庙礼乐制度仍依据神仙方士之说,不合西周古制者甚多,于是在西汉中后期兴起了一场以复兴古礼为目的的儒学复古运动,其高潮就是元始改制,其结果就是王莽代汉。王莽虽然身败名裂,但“元始改制”的成果,西周模式的郊庙礼乐制度被东汉王朝承袭,并成为历代礼乐郊庙制度的正统。林存光《汉代儒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分析与批判》(《孔子研究》,2002年第1期)认为,儒学在汉代意识形态化而成为一种官方指导思想,具有特定的意识形态功能,表现在三个方面,汉儒以文化守成自任而成为意识形态阶层职能的自

觉意识，儒学意识形态的合法化功能在对自身的反思与辩护的两个层面运作，儒学阐明现状和提示行动方向的社会历史功能。该文对这三个方面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并给予了历史的批判。

第五，两汉儒学人物及其思想研究一直为研究者所重视，论著、论文层出不穷，思想人物评传更是比较集中地出现。比如董仲舒研究方面有，华友根《董仲舒思想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3月)，王永祥《董仲舒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黄朴民《天人合一：董仲舒与汉代儒学》(岳麓书社，1999年1月)，李宗桂《董仲舒与中国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周桂钿《董仲舒评传》(广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余治平《惟天为大——基于信念本体的董仲舒哲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12月)。其他方面有，王兴国《贾谊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1月)，该书在充分占有原始资料并认真分析前人及时人对贾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其生平事迹及著作真伪、写作年月进行了比较详尽的考辨，对许多理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某种程度上是贾谊研究的总结性著作。该书还对陆贾、晁错的生平、思想进行了系统分析，亦不乏新意。其他还有，张大可《司马迁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许凌云《司马迁评传》(广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钟肇鹏、周桂钿《桓谭、王充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11月)，王举忠《王充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周桂钿《虚实之辨：王充哲学的宗旨》(人民出版社，1994年)。王青《扬雄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陈其泰、赵永春《班固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周桂钿《虚实之辨：王充哲学的宗旨》(人民出版社，1994年)，刘文英《王符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9月；该书附有崔寔和仲长统评传)，王伯欣《王符评传》(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黄朴民《何休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卢央《京房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许结《张衡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2月)，马育良《汉初三儒研究》(黄山书社，1996年)等。

### 三、汉代历史与儒学的多样化研究

近些年一些学者利用考古学物质文化资料，对儒学有关问题进行研究，其成果值得注意。如信立祥的《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2000年8月)，通过对汉代画像石内容题材的研究，对汉代人的生死观、鬼神观、宇宙观等进行了研究。著者认为，“在汉代人的观念中，上帝和诸神的天上世界是最可怕的地方”，董仲舒“畏天之威”的“天人感应说”“拉大了人间世界和天上世界的距离，加剧了人们对上天的恐惧”，从而使人们走向了“鬼魂世界”和“仙人世界”。何平生《巡狩与封禅——封建政治的文化轨迹》(齐鲁书社，2003年1月)第三章第二节“礼仪与思想”，对封禅典礼与儒家文化、东汉儒学谶纬与汉光武帝封禅、汉章帝巡狩的儒学思想背景等问题有所考察和研究。刘厚琴《论儒学与两汉复仇之风》(《齐鲁学刊》，1994年第2期)、臧知非《春秋公羊学与汉代复仇风气发微》(《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张涛《经学与汉代的丧葬、祭祀活动及复仇之风》(《山东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等文认为，两汉民俗中的丧葬礼仪、随葬器物都受到经学的影响，盛极一时的复仇之风更是儒家经义的体现。徐国荣《东汉儒学名士的薄葬之风和吊祭活动的文化蕴涵》(《东方论坛》，2000年第4期)认为，东汉儒学名士的薄葬之风和在吊祭活动中的态度是对世俗厚葬流弊以及浊流阶层的反其道而行之。马振铎《试论楚蛮夷神话和巫术对汉代儒学的影响》(肖万源主编《儒学与中国少数民族思想文化》，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一文中提出，在汉代，当荆楚蛮夷的“巫文化”渗入之后对儒学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儒学一反先秦的“不语怪、力、乱、神”的理性主义而逐渐染上了一种妖异诡怪的色彩，使儒学最终沦为谶纬之学。相反，与巫术相联系的神话，特别是开天辟地神话，对汉代儒学的影响却是积极的，激起汉代儒者对宇宙终极的关怀和兴趣，引出汉儒的天地宇宙生成论和以浑沌元气为宇宙本质的思想就是蛮夷文化中的开天辟地神话。

以上所述限于篇幅，仅就主要的一些著述进行了搜罗和概括，意在为当前的学界提供一些相关的研究信息，难免举一遗十，挂一漏万，有待于以后更为广泛深入地收集和总结。

来源：墨如金传统文化网

责任编辑：志纲